

每一个名字都对应着生命的尊严

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伊春空难的遇难者名单,是在8月25日公布的,距空难事发只有13个小时。每年都会发生不少群死群伤的悲剧事件,这大概是第一次,人们能够获得事件中全体遇难者的名单,而且是如此迅速。

航空运输的精确记录,对及时公布遇难者名单应当是起了重要作用,并不是所有重大死难事件,都能够如此方便地确认遇难者的名字。然而,有太多的死难事件没有公布过名单,决定性的因素恐怕并不在无法确认名单,而是对名单公开的忧虑。

没有人要求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完全名单”,公开名单只需要尽其所知,而不是非得无一遗漏不可。但是很多时候,事件处理完毕,名单仍然不会公布。

矿难,爆炸,重大火灾,洪水灾害,城市高架桥倒塌,地震,泥石流……这些都是没有死难者名单的。有的时候,死难者名单成为秘密,更多的时候,死难者名单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在日常的意外和事故中,死难者大致上是没有姓名的,人们知道的只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个具体的人,对应着一个家庭,一个人群,一串故事,一种生长的经历,一个与世界发生联系的特殊方式。名单或许确实是敏感的,但没有任何敏感可以取消生命的价值。

是“车祸死亡两人”,这两个人是不重要的,车祸相当于一块橡皮,把两个人悄然抹去。在重大事故中,死难又成为一种令人害怕的事实,名单由此变得敏感,它牵涉到事故的重大程度,善后方案,有多少家属“情绪稳定”等等。

灾难越是重大,名单越是隐秘。死亡随着灾难的重大而变成单纯的数字统计,个体不再具有意义,所以名单几乎是不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有谁硬要整理一份名单,那么居心何在可能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死难名单的征集,可以算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数十万死难者,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因为这场死难与民族史、国家史的宏大场景相联,与“抗拒遗忘,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现实政治相联,所以遇难者名单得以出版,得以镌刻。就像每发现一个“日军侵华铁证”都会被报道,那些名字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铁证”而获得意义的。

唐山大地震遇难者名单也刻写在墙上,但这没有“铁证”的意义,只有生命的悲悯,但也正因如此,征集是无须特别努力的。

近年,我们已经过三次“全国哀悼”,汶川、玉树和舟曲,遇难者的

统计都精确到了个位数,但这些遇难者的名字呢,没有任何方式公布过名单。哀悼是一个整体的气氛,无法具体到个人,被哀悼的人作为个体是无名的,仿佛从来就没有过名字。

在那些更常见的重大事故或者灾害中死去的人,不会得到哀悼,同时也没有名字。一个普通的人,名字是不足挂齿的,死也不必称呼其名;重要人物,才值得称呼其名,乃至不敢称呼其名,必须在名字前后加上身份。

但名字是否需要被提及,不只是基于中国式的姓名社会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人的具体存在的无视,而且具有政治社会学的考虑。遇难者的名单,含冤者的名单,成了死亡与冤屈的集合,不止产生了“集中”所带来的社会震撼,而且每一个苦难都可能意味着一系列的善后麻烦,可能意味着“情绪稳定”的反面,意味着一个个去核调查,令人担忧于由此及彼的联动效应。

每个人都在历史之中,既经历个人的生命历程,也经历一切生逢其时的社会历史。作为个人,生命被认为不具特别的意义,“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是无足轻重的”;而作为社会历史的一部分,遭遇及结局又因

为牵涉时代、社会以及一切伟大庄严的东西,又变得特别敏感。一切重大的历史,都落实到具体人欢欣与悲苦的命运。

有太多历史难以回首,所以有太多历史没有名单。久而久之,死难作为集体事件,不宜没有名单;死难作为个人事件,无须有名字,已成为通例。社会对人的名字的态度,就是我们看待人的生命的态度,它作为个体生命无意义,作为社会与政治的载体则敏感。

生命以个体的形式而存在,也以个体的存在为基本意义。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个具体的人,对应着一个家庭,一个人群,一串故事,一种生长的经历,一个与世界发生联系的特殊方式。名单或许确实是敏感的,但没有任何敏感可以取消生命的价值。

一切生活者,都应有姓名。所有事件中,都应有名单。

刘洪波



温家宝

“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8月27日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挟尸要价”的事实不容置疑

回应《挟尸要价真伪——风口浪尖上的道德叩问》(8月22日柒周刊A4版)

大学生见义勇为献出年轻的生命,打捞队挟尸要价不仅是不妥,更是见利忘义。在“挟尸要价”整体真实的前提下追究照片所谓的“细节真实”必然要触犯众怒:见义勇为者献出生命,竟然还有人乘火打劫,让失去亲人的

人们承担更多的悲痛,这不是可耻是什么?挟尸要价的事实不容置疑,但世人与其纠缠于一张照片的真伪,不如多来些道德叩问: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宿迁 谢庆富)

别给选民罢免代表设障碍

回应《选民对代表不满意当然可以罢免掉》(8月22日柒周刊A7版)

人大代表是由选民选举出来的,如果选民感到不满意,当然可以申请罢免。但实际情况是:人大代表被选举上容易,被罢免难!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说明,选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难以实行。我

国正在建设法治社会,而只有当选民申请罢免人大代表这样的新鲜事物越来越常见,选民实行基本权利的环境越来越宽松,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南京 陈魁)

“微小青春期”普及得迟了一些

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微小青春期》(8月22日柒周刊A3版)

三名婴儿乳房发育异常,让我们认识了“微小青春期”。对有关专家来说,这是对公众科学常识的一次普及,但在在我看来,“微小青春期”却是我们社会的

“痛”。因为“事后诸葛亮”往往让我们付出更多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在“亡羊补牢”的同时,更应该做到“未雨绸缪”。

(无锡 彭爱珍)

对博物馆实行分级管理

回应《南京民营博物馆调查》(8月22日柒周刊A8版)

公办的博物馆生命力强,规模小的、民办的博物馆则随时面临夭折的风险。我以为博物馆不应以大小、公私区分,只要有个性与特色,国家就应该按照稀缺程

度进行分级管理,级别高的得到政府优待(政策及资金扶持)也多,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浙江嘉兴 李忠卿)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我们将诉诸法律,讨个说法。”

——河南省曹操高陵考古队领队潘伟斌称,一些人利用苏州论坛,严重败坏了考古队和他本人的声誉。

“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串串。”
——著名科学家袁隆平希望杂交水稻能够走向全世界,到他90岁时争取水稻亩产一千公斤。

“大家赶快撤离!赶快撤离!”
——在伊春空难中不幸遇难的客机乘务长卢璐,在飞机摔在地上的危急时刻不忘指挥乘客逃生。

“降雨少才是大旱主因。”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接受采访时,否认建水电站导致今年西南大旱。

“钱是很多,但不懂议政。”
——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称一些委员既不敢批评又不敢拿出措施。

“钱文忠的语录就是‘随地吐痰’。”
——评论家叶匡政批评学者钱文忠刚出版的两本语录是自曝其短。

“原来我以为我来了大陆,就忘记了台湾,现在走进台湾馆,我发现原来我没有忘记。”
——李敖参观世博园,在台湾馆点灯祈福,祝愿“两岸和平”。

“以色列太弱,无法跟伊朗展开军事对抗。”
——伊朗总统内贾德认为以色列“没有勇气”军事打击伊朗,而且以方的威胁并不是认真的。

“他(叶利钦)步履蹒跚地走出克里姆林宫,突然,他在车旁停下来,凝视着我,说:‘请护佑俄罗斯!’……”
——俄罗斯总理普京为日前出版的《叶利钦》一书作序,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与仰慕之情。

“那些肮脏的人想要我的命。”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笑称,有关他患上癌症的传言是其敌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现代快报
星期柒新闻周刊



(上周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

白岩松
新闻 171



“人们道德方面做不到,又没有硬性规定,所以这个传家宝中间就断了。”

——白岩松认为要真正做到“领导下井”,不能靠领导的道德觉悟,应该靠可以执行的强制性规定。

孟非
零距离



“这不是一个产生钱钟书的时代。”

——陕西省招办拒绝将“国学天才”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孟非认为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不是天才而是公平。

东升
东升工作室



“纳税人是老板,职能部门是伙计,哪个老板不希望自己的伙计勤快负责,干出成绩呢?”

——东升希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主动、有效地担负起监督食品安全的责任。

吴晓平
听我韶韶



“它是自然界的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也讳莫如深呢?”

——老吴希望政府部门彻查“龙虾门”,不要让老百姓提心吊胆。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E-mail:njmengqiu@163.com